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研究^{*1}

聂选华

(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 云南昆明 650091)

【摘要】: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及全面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实践和重要保障。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和文化历史条件决定了各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表现为生态空间遭受严重破坏、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缺失、经济发展方式制约生态和谐、缺乏对民族生态文化的弘扬等矛盾和困境。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积极统筹区域生态功能规划,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有序调整产业结构,弘扬民族生态文化,开展生态教育,是有效破解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推进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X17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254(2017)02-0033-07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禀赋良好,生态环境的多样性、生态系统复杂性和民族文化的多元性特点,极大地丰富了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目前,关于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其成果主要集中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个案研究、生态环境变迁与保护、生态安全、生态移民、民族生态文化等方面,而对其可持续性发展的探讨较少。因此,有必要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困境与矛盾、存在的问题、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及路径选择进行详细探讨,正确分析其优势和不足,以推进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一、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矛盾与困境

生态文明是超越工业文明、以解决人类和自然界之间危机为使命、关乎人类未来和发展命运的崭新的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模式,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反思与实践调整^{[1]6}。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地域性、民族性和文化多样性相互交织,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特殊性、复杂性和不协调性,进而使经济社会与环境发展成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中较为突出的问题。随着云南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和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进程的推进,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矛盾与困境共存。

(一)生态空间遭受严重破坏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主要有25个边境县和3个藏区县,这些地区集边境、民族及贫困于一体,是国家生态扶贫的重点县,其

1 收稿日期:2016-03-16

基金项目:第二批“云岭学者”培养项目“中国西南边疆发展环境监测及综合治理研究”(201512018);云南大学服务云南行动计划项目“生态文明建设的云南模式研究”(WX151605)

作者简介:聂选华(1987-),男,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时期西南灾荒史、环境史及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发展关乎国家边疆生态安全建设大局。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不仅是经济问题和发展问题，更是民族问题和民生问题。当前，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主要江河、湖泊、湿地、林地、草地和农业用地等空间逐渐遭受挤压，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等问题不断显现，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趋势未能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系统的平衡性被渐次打破，生态空间逐渐缩小。总体上看，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环境容量趋于饱和，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峰值，进行基于生态功能空间差异性的生态调控显得很有必要。

(二)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缺失

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2] 由于受区域既定利益机制、产权机制以及制度变迁成本的交互影响，云南边疆各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多重路径依赖与锁定效应交错存在，并导致区域性生态文明建设缺乏有效保障。“生态文明制度是一切有利于推动、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定的总和，它由正式制度(环保法律、法规)、非正式制度(环境伦理、环保观念等)和实施机制构成。”^[3] 从这个层面来看，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缺乏总体规划和具体指导，缺少健全的公众参与机制，生态文明建设路径选择模糊，制度创新乏力，生态文明建设实效难以显现。

(三) 经济发展方式制约生态和谐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人多地少，有较大面积的国土空间属自然环境恶劣和生态脆弱的地区，畸形的土地结构及利用方式已引发系列生态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涉及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而且涉及到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4] 伴随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国土开发承载着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等重担，若不能有效统筹国土开发和利用与生态空间的关系，也将无法改变制约生态和谐的经济方式。在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初步发展起来的经济环境下，如何正视和破解环境问题并落实和承担环境责任，已成为制约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问题。

(四) 缺乏对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弘扬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低产值、高能耗、高污染的生产模式普遍存在，低能耗、高产值、绿色化的产业难以形成，各民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制约着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和层次的提高。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污染控制和生态恢复，而应因地制宜，克服当代工业文明弊端，积极探索适合各民族地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协调发展的路径。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缺少对各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态思想、生态哲学等传统生态理念的传承和弘扬，也缺乏对各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和生态伦理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延伸和物化。

二、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是由各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所具备的现实条件决定的。

(一) 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是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南，后者是对前者的丰富和发展。俞可平认为：“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作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5]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生态哲学的基本问题，“从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生态观的基础，而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异化的批判中，可以看到他对于生态问题的切实关注。”^[6] 生态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从哪种视角理解人在自然界整体中的位置和以何种方式解析人与自然在全部存在中的关系。马克思在制度批判和社会变革的语境中，从自然和社会的交互关系来充分探讨生态问题，在解决一切生态问题的途径上，马克思强调坚持制度变革、科技进步与人道主义相统一的原则。“马克思

主义生态哲学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把自然作为人的劳动对象纳入人的活动范围来考察，将实践观点引入认识论，通过劳动和实践，把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统一起来，把人、生产工具与劳动对象这三大要素也结合起来。”^[7]马克思主义从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阐述人一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生态思想，这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关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8]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在对资本主义的破坏性行为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对避免重蹈覆辙提出警示。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并被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十八大又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9]。十八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10]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要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指导下，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的关系，有效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统筹各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各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延续和生长，需要在生态文化不断调适的过程中寻求发展。长期以来，各少数民族先后创造出适应民族生存需要的物质生产体系，经过物质文化的积累形成独特的环境体系——民族生境。“民族生境不仅包括该文化所处的自然环境，而且还包括该文化所处的社会环境，这二者的统一体构成特定文化的民族生境。”^[11]“生态环境和可利用的自然资源不同，人类就会创造出不同的生计方式，这就是适应——文化对生态环境的适应。”^[12]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需进一步统筹传统生态文化与民族生境的协调发展，积极弘扬各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和生态伦理，并使之与区域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相适应。

加拿大跨文化心理学家贝瑞(Berry)在“跨文化适应模型”研究中指出，完整的文化适应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在文化层面或群体层面上的文化适应……另一个层面是指心理或个体层面上的文化适应”^[13]。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文化传统、特定文化和特定因素或性质都具有持续性、‘生存力’或‘惯性’，这就是文化的稳定性原则”^[14]。因此，云南边疆各民族传统生态文化思想依然居于主体地位，构成了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的发展观，能够推动民族地区人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环节中，需整合各民族的传统生态思想、生态伦理、生态道德等文化资源，大力弘扬民族传统生态文化，以促进生态环保及实践的有机结合。

(二)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向度

2015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云南调研时强调，“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15]。云南与老挝、越南、缅甸等国山水相连，是一个高原山区省份，是全国世居少数民族最多、跨境民族最多、特有民族最多、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最多的省份^[16]。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是中国大陆连接东南亚、南亚和西亚以及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必经通道，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可为周边国家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提供范本和借鉴。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地处伊洛瓦底江、长江、怒江、澜沧江、红河和珠江等六大水系源头或上游，独特的区位优势 and 自然环境对云南、全国甚至东南亚的生态安全建设都有较大的影响。尽管当前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先后出现不同程度的水土流失、石漠化、生态功能退化、生态灾害频繁发生等系列现象，但局部地区生态环境还是呈现出改善的势头，生态试点示范建设有序开展，自然资源信息化和资源信息保障能力建设以及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工作取得初步成效，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得到有效保护，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强大的动力。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是云南改革开放的前沿，各民族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立足于区域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存在，加强生态意识文明、生态行为文明、生态制度文明以及生态产业文明建设，才能为新时期云南“桥头堡”战略、“一带一路”战略和绿色经济强省的战略目标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各民族聚居地区的资源环境问题是制约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瓶颈，各地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建设缺乏有效落实，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

(一) 工矿企业污染严重

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经济发展高投入、高排放、高能耗、高污染、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等问题较为严重，经济效益主要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环境为代价而获取。例如，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铅锌矿开采致使矿区周边生活环境遭受重金属污染严重，调查结果显示：兰坪铅锌矿周边种植的蔬菜中铅、锌、铜、镉的含量大部分超出国家食品卫生标准，超标率分别为 51/77(66.23%)、20/77(25.97%)、0/77(0.00%)和 24/77(31.17%)，该铅锌矿周边蔬菜中 Pb、Cu、Cd 污染较严重^[17]。兰坪县铅锌矿区周边农田种植的玉米根、茎、叶和籽实 Pb 的平均含量分别为 219.17mg/kg、99.2mg/kg、142.86mg/kg 和 79.18mg/kg；农田土壤 Pb 含量为 1126.12~3640.25mg/kg，是我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的 7.5~25.8 倍；采矿区 13 个玉米样品籽实 Pb 含量超过我国粮食卫生标准(NY861—2004)的 19.1~588.9 倍^[18]。各类矿产资源开采、冶炼产生的矿渣、尾矿、废渣等堆放及处理不当，雨水过后被酸溶出含重金属离子的矿山酸性废水，随矿山排水和降雨进入土壤和河川径流，并直接或间接地造成土壤的重金属污染。

(二) 生态环境脆弱化

云南西北部地质特殊、地形复杂、气候多样，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和民族文化多元丰富的地区之一，我国水资源、有色矿产资源和生态景观资源都富集于此。该区域自然景观有 4 大类、38 小类，许多景观具有唯一性、典型性和区域代表性，但生态十分脆弱。这一地区也是我国植被类型和动物物种最为多样的地区之一，全省 12 个植被型、169 个群系，滇西北有 10 个植被型、98 个群系。据记载，高等植物(苔藓、蕨类和种子植物)有 10198 种(含种下等级)，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49 种，约占全国重点保护植物的 22.1%；有脊椎动物 1017 种，其中有哺乳动物 184 种、鸟类 580 种、爬行动物 65 种、两栖动物 49 种和鱼类 139 种^[19]。虽然滇西北物种丰富，但大多数物种的种群数量少、自然地理分布狭窄，适应能力低，对于外界干扰非常敏感，在遇到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后，极易陷入濒危状态甚至灭绝。尤其是高海拔、气候寒冷、山高坡陡、土地贫瘠等因素，使得植被恢复和演替过程非常缓慢。

云南西北部地区是北半球生态系统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这里保存有全球面积最大的低纬度寒温带针叶林生态系统。德钦、维西、香格里拉、贡山等县海拔在 3000 米以上地区的森林占各县森林总面积的 80%以上；维西、宁蒗、玉龙、福贡、兰坪等县集中分布在海拔 2000—3000 米的森林占各县森林总面积的 60%以上^[20]。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位于横断山生态脆弱地区和云贵高原生态敏感地区，是我国乃至国际重要河流的源头或中上游，既是东南亚国家和我国南方大部分省区的“水塔”，也是我国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集聚区和物种遗传的基因库，更是外来有害生物、疫病的天然阻隔屏障，生态区位十分重要，防护林体系建设任务繁重^[21]。由于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农业生产、工业投产、居民生活对自然生态环境干预力度不断加大，各生物物种及种群不断减少，自然生态环境渐趋脆弱化。

伴随喀斯特地区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以及土地生产能力衰退，脆弱的生态环境使石漠化不断扩展，并成为岩溶地区最大的生态问题。文山州是云南典型的岩溶地区，全州国土面积 32239 平方公里，山区、半山区占土地总面积的 97%；岩溶面积为 16799 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 53.4%。其中，中度石漠化地区占 51.84%，重度石漠化地区占 26.99%，轻度石漠化和极重度石漠化地区分别占 16.25%和 4.92%^[22]，全州 8 个县(市)有不同程度的石漠化分布，且石漠化地区主要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山穷、水枯、林衰、土瘦相互交织，导致人地矛盾比较尖锐，部分地区已陷入人口增长、生态恶化和贫困的恶性循环，石漠化严重制约当地生态文明的建设进程。

(三) 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淡薄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资源缺失和生态环境脆弱致使生态退化和生态贫困相互叠加，各民族生产生活必需的自然环境要素较为匮乏，水资源不足、植被覆盖锐减、土壤肥力下降、生态灾害频发，具有生态型贫困的特征。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公众环保意识隐含四类矛盾：一是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与保护环境的矛盾；二是个人投入与国家投入之间的矛盾；三是主张依法保护环境与法制观念淡薄之间的矛盾；四是个体环境意识觉醒与群体环保意识薄弱之间的矛盾。多重矛盾在边疆各民族的思想意识中普遍存在，公众的行为和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与环境保护脱节，进而导致公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表现出的个人或集体行为对生态文明建设来说是消极的。另外，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自然生态环境遭到肆意破坏，资源和能源被过度消耗，环境基础设施滞后，治理速度赶不上污染速度，政府与工矿企业之间相互推卸责任，整治违法行为避重就轻，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措施难以有效落实。

四、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是适合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较为适合的路径选择。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提出，要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从人与自然互动的关系来看，从根本上说“人类本身的和解”^[23]至关重要。“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把作为理论设计和实践方案的生态文明所具有的理性、价值、伦理和制度等四个维度，综合内化为整体性的行动指南，并在生态文明实践的落实过程中时刻践行之。”^[24]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最现实、最关键的就是处理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一）统筹生态功能规划，协调经济社会发展

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要继续实施“生态立省、环境优先”战略和“绿水青山、节能减排、防灾减灾”计划，持续开展七彩云南保护行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森林云南”建设，开展生态红线保护、陡坡地生态治理、生态公益林保护、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与修复、高原湿地保护与恢复等，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促进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25]。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对各类生态功能区实行统筹规划；以自然保护区、生态功能保护区、生态脆弱区的建设和保护为主体，保护和恢复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明确各生态功能区的发展内容和目标；有效加强重点湖泊、江河流域水质治理，加强水土流失治理、石漠化范围控制和生物物种多样性保护；建立健全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指标体系，全面提升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二）积极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要从民族地区的资源量和环境承载力出发，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生产力，促进环境保护参与综合决策，编制生态文明建设方案，大力促进“生态优势转化”^[26]。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着力发展生态工业，借力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产业，在改造提升优势传统农业的同时，大力培育战略型新兴生态产业，“使产业结构向协调化、高效化与软化的方向发展”^[27]。把环保与产业结构调整、污染防治与企业节约增效、节能环保产业同扩大需求及生态保护与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结合起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建立可持续的绿色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生态文明社会要通过资源增殖和信息增殖途径来实现”^[28]，要以生态发展能力为着眼点，以绿色科技为动力，拓宽环保科技融资渠道，开拓环保科技市场，推动环保技术创新，促进环保技术成果化。创新生态产业发展模式，“争取在以循环经济、可再生能源的替代性开发等为主要特征的新生产方式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力争走上生态现代化之路”^{[1] 171}。

（三）健全生态补偿机制，落实环境保护责任制

生态法律制度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护身符”，是生态文明的重要标志。要充分发挥制度安排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引导作用，规范人们各种可能影响环境的行为，强化生态教育制度，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建立生态经济激励制度^[29]。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建立环境保护执法监管共同责任机制，推进市场主体环保工作与绩效考评、责任追究管理机制相结合，

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重点建立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以多样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以机制和责任制解决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四) 弘扬民族生态思想，推进生态文化创新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各民族内容丰富的生态文化和生态智慧，是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文化载体，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驱动因素。生态文明建设强调给予自然环境以平等权利和现实人文关怀，先进的生态伦理观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维度^[30]。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各民族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里创造出多样性的民族生态文化，形成独特的民族生态文明伦理观和丰富的生态环境保护文化，但由于“传统生态文化与现代生态文明观存在着明显的差异”^[31]，各民族地区需要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图书文献等手段，充分挖掘、传承、弘扬和保护各民族优秀的传统生态文化，促进各民族生态文化信息化和现代化；在生态文化遗产丰富、保持较完整的民族地区，建设一批民族生态文化保护示范区，加强各民族地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植物园、动物园、民族生态博物馆以及自然博物馆等生态文化平台的建设和管理。

(五) 开展生态教育，提高公众生态文明意识

生态文明创造的生态环境、生态理念、生态道德和生态社会等，直接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必不可少的生态基础^[32]。在生态环境危机面前，教育要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唤醒公众关爱自然和保护环境的重任。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要适时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教育和宣传，这是培养边疆民族地区公众环境保护意识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和最基础的工作；同时要积极动员地方社会力量参与生态环境教育和保护工作，充分承认群众的环境信息知情权、环境决策参与权和环境监督权，确保公众有效行使环境权利和履行环境义务；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生态文明教育，引导公众全过程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健全公众参与生态文明教育和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

五、结论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要以发挥好“一带一路”建设区域综合先行示范区为契机，以符合生态环境发展规律和经济发展长远规划为出发点，兼顾自然与社会各方利益群体的不同需求，保持各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平衡性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积极主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开展生态扶贫的过程中，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要紧紧密结合各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和特点，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积极转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模式和价值观念，探索适合地方经济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有效方法、路径和模式，以促进各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王宏斌. 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 [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 [2] 格拉斯·C·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M]. 刘守英, 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4:3.
- [3] 赵志强. 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 [J].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15(9):90.
- [4] 侯丽清, 郝爱萍. 论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 [J].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2):22.
- [5] 俞可平. 科学发展观 [C] //薛晓源, 李惠斌. 生态文明研究前沿报告.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18.
- [6] 李富君. 马克思的生态观发展轨迹初探 [J]. 河南社会科学, 2004, 12(3):14.

- [7] 刘文超.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依据及其路径选择 [D]. 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 2012:14.
- [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20.
- [9]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 人民日报, 2012-11-18(1).
- [10]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EB/OL]. (2015-10-29) [2016-01-12].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29/c_1116983078.htm.
- [11] 杨庭硕, 罗康隆, 潘盛之. 民族文化与生境 [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1.
- [12] 尹绍亭. 尹绍亭学术文选 [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4:70-71.
- [13] BERRY J W. Psychology of Acculturation, in J. J. Berman (ed.),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1989 :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M]. 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0:201-234.
- [14] 托马斯. 哈定. 文化与进化 [M]. 韩建军, 商戈令, 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44.
- [15] 曲冬梅. 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N]. 光明日报, 2015-3-11(6).
- [16] 黄涌起. “民族云南”释放新张力 [N]. 民族时报, 2015-1-15(A01).
- [17] 张晓云, 李蕴成, 宋正蕊, 等. 兰坪县某铅锌矿周边主要蔬菜水果重金属污染状况调查分析 [J]. 微量元素与健康研究, 2010, 27(3):34.
- [18] 杨炳旭. 兰坪铅锌矿区周边农田土壤——玉米体系 Pb 含量及其污染特征研究 [J]. 环境科学导刊, 2013, 32(5):6.
- [19] 七彩云南保护行动网. 滇西北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2008—2012年) [EB/OL]. (2009-5-26) [2016-01-12]. http://www.7c.gov.cn/color/DisplayPages/ContentDisplay_391.aspx?contentid=26847.
- [20] 迪庆藏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迪庆藏族自治州志(1978—2007) [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4:325.
- [21] 张伏全. 云南防护林工程建设任重道远 [J]. 云南林业, 2014(4):58.
- [22] 王晓洋. 文山地区石漠化成因、危害及防治 [J]. 安徽农业科学, 2014(29):10288.
- [2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15.
- [24] 田启波. 生态文明的四重维度 [J]. 学术研究, 2016(5):37.

- [25] 陈豪. 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 [N]. 经济日报, 2015-3-5(9).
- [26] 刘耀彬. 区域生态优势转化与生态文明建设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66.
- [27] 李春发, 李红薇.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产业结构理论及应用 [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5:75.
- [28] 刘宗超, 贾卫列. 生态文明理念与模式 [M].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5:13.
- [29] 张文台. 生态文明建设论——领导干部需要把握的十大基本体系 [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0:29.
- [30]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探索中国环境保护新道路”课题组. 生态文明与环保新道路 [M].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0:14.
- [31] 叶文, 薛熙明. 生态文明:民族地区生态文化与生态旅游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164.
- [32] 刘铮. 生态文明意识培养 [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28.